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of Poems in Political Texts: Take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s an example

ZHU Sizhe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November 6, 2022

Accepted: December 20, 2022

Published: March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ZHU Sizhe. (2023).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of Poems in Political Texts: Take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1), 150–15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6](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6).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6>. p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entitled “A Corpus-based Study on Strategie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llus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ponsored b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Jishou University JGY2022050.

Abstract: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is currently dominated by the rhymed translations of poetry represented by Xu Yuanchong and the unrhymed translations of poetry represented by Weng Xianliang. Both of these poetry translation methods have provided us with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However, volumes 1 to 3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s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wisdom, Chinese plans, and Chinese theories,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However,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three volum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relevant verses do not copy the existing translations of famous translators, but instead, use the paraphrasing method to render these verses. By collecting representative verses on different topics and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lators'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poems in the three volume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paths of poetry translation,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and merits of the paraphrasing method as the main path of translating poetry in political texts, and provides a prac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paraphrasing method of poetry translation.

Keywords: the path of poetry translatio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paraphrase method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U Sizhe is a postgraduate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t Jish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時政文中詩歌翻譯的另一種路徑

——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為例

朱思哲

吉首大學

摘要：我國的詩歌翻譯目前以許淵沖為代表的韻體譯詩和以翁顯良為代表的散體譯詩為主。這兩種詩歌翻譯路徑都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然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到三卷作為對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理論的權威解讀，其內運用了大量的中國古代詩歌。然而該三卷本的英文版中，相關詩句的英譯版本卻並未采用各翻譯名家已有的譯文，而是另辟蹊徑，運用釋義法重新翻譯了這些詩句。筆者通過搜集三卷本中有關不同主題的代表性詩句，對比不同譯者對三卷本中相同詩歌翻譯的異同，總結詩歌翻譯的不同路徑，探究釋義法作為當今時政類文本詩歌翻譯的主要路徑的可行性，為推廣釋義法用於詩歌翻譯提供實踐依據。

關鍵詞：詩歌翻譯路徑；《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釋義法；

基金項目：吉首大學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基於語料庫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用典英譯策略研究》（項目編號 JGY2022050）之階段性成果。

引言

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出版以來，一系列的宣介活動使《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強烈反響，隨著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陸續出版發行，三卷本及其外文版向世界展示了一個真實、全面、生動、富有生機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中國。因此，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文學外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必經之路，最能體現中國文學和文化特點的中國詩歌的外譯又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總書記經常引用中國傳統詩文，用詩文來強調特定的主旨。這些詩文的表達，在新時代的中國依舊具有極高的生命力，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引用詩文表達，在翻譯傳播的過程中，不僅僅弘揚着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也傳遞着新時代的中國精神、中國思想和中國戰略，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據筆者統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至三卷中包含了 50 余句詩歌，其中 41 句以詩句的形式翻譯了出來，其餘部分則由譯者直接將意思揉進了話語中。這些古詩詞準確地穿插在總書記的語言中，在包括教育、社會、經濟、文化、自然、政治、軍事和外交在內的主題中均有體現。例如對於教育，習總書記提到「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談到社會發展時，總書記希望我們「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些古詩詞都在之前被許淵沖、楊憲益等多名翻譯家翻譯過，而在三卷本英文版翻譯過程中，為確保翻譯的準確性和可讀性，在準確翻譯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髓的同時，譯文精益求精，充分尊重、考慮了目標語言的文化傳統和用語習慣，英文版中詩歌的翻譯並沒有沿用先前翻譯家們的譯文，而是走釋義法的路線進行了重新翻譯。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至三卷中的詩句是釋義法運用於詩歌翻譯實踐中的一次偉大嘗試，並證實了其在時政文中的可行性與實用性。



一、詩歌翻譯的傳統路徑

(一) 韻體譯詩

在中華文化復興的當下,詩歌作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已有諸多譯者們在從事著相關的工作。目前大部分的中國譯者執著於韻體譯詩。他們認為,韻譯是基於對翻譯本體論的正確認識而創生且可應用於漢語古詩英譯實踐的翻譯要求和方法。中華經典外譯缺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對翻譯本體論的淡漠,只有抓住翻譯的本質才能構建起翻譯理論,只有秉持「是其所是,歸其所歸,分其所分」的邏輯理路,才能把正翻譯研究和翻譯實踐的「方向盤」。葉友珍和趙正道提出,「我們要界定翻譯的本質屬性和偶然屬性,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什麼不是翻譯的屬性,這是區分譯與非譯的根本所在」(葉友珍、趙正道,2017: 86)。漢語古詩的詩體特征即形式是詩意得以承載的重要前提,也是詩韻得以營造的關鍵條件。對於「形」的認識可追溯到柏拉圖的「理式」、亞裏士多德的「形式因」、阿波羅尼奧斯(P. Appolonius)的「框架」(scheme)以及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提出的「形式是藝術的開端」。因此,「以韻譯韻」基於「詩何以為詩」的本體論的、可保證「譯詩依然為詩」的翻譯方法論。

辜正坤(1998: 225)指出:「詩歌之所以謂之歌,就在於其音樂性,而音樂性的體現多半要靠格律,如譯詩能以格律見長,陪襯原詩意境,當如錦上添花,有何不可?或曰格律太束縛人。當然束縛人,大匠運斤,必有規矩,其高超的技術往往不出繩墨之外。能合於法度,而又能遊刃有余,從心所欲不逾矩,才真正稱得上大家。」

許淵沖曾說:格律體譯詩,往往能達到自由體或散體譯詩無法達到的高度。憚於「因韻害義」而把詩歌的押韻一棍子打死,如此做法,實無異於因噎而廢食。至少,按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藝術,格律體譯詩也應該是——實際上早已成為——詩歌翻譯領域裏面的一個流派。(許淵沖 2003)

可見,由於漢字字音上的特點,中國人對「韻」感知較早,所以韻詩量豐富(張世祿 1984: 86),這也直接導致了中國譯者們對於「韻」的執著與追求,他們主張「韻不絕,詩乃存」,詩歌是因為有了「韻」才被稱為詩歌,丟掉了「韻」也就丟掉了詩歌的靈魂。

(二) 散體譯詩

提到漢詩英譯的散譯就不得不提翁顯良(1924-1983)、霍克斯(1923-2009)以及洪業(1893-1980)三人。其中,翁顯良(1987: 285-286)提倡的散體譯詩,他本人也是真真正正把散體譯詩當做了自己一生譯詩的準則。散體譯詩與霍克斯而言則是為了翻譯教材而采用的變通之法。而洪業則是將散體譯詩當作了自己學術研究的一部分。

按照地域劃分,漢詩英譯的散譯可以分為國內散譯傳統與國外散譯傳統兩種。翻譯界對於韻體譯詩的翻譯家可謂如數家珍,而談論到散體譯詩卻除翁顯良外再無他人。如此說來,翁顯良是國內散體英譯漢詩的第一人。他在《古詩選譯》的小序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詩言誌,而言誌的不一定是詩。詩人的誌,寓於形象;詩人的言,協乎聲律。譯詩的難處,在於再現形象與改創聲律。再現形象,不能背離詩人的本意,……然而再現絕不是臨摹,似或不似,在神不在貌,不妨得其精而忘其粗……至於聲律,語言不同,自然要改創,更不必受傳統形式的束縛,押韻不押韻,分行不分行,一概無所謂,……可是,長短輕重,抑揚緩急,都要隨意而轉,卻也不怎麼自由。不可自由而

自由,失之於蕩,算不得翻譯。可自由而不自由,失之於泥,談不上氣韻。(轉引自童元方,2015: 50)

事實上,翁氏的散體譯詩取得了不小的成功。童元方(2015: 50)曾經對翁譯評價道:「讀翁的譯詩,不像讀譯品,卻像直接讀創作,使人有時驚喜到一定程度因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散體譯詩傳統在海外的歷史似乎要悠久很多。阿諾德(Matthew Arnold)與貝洛克(Hilaire Belloc)都曾極力倡導用散文體來翻譯詩歌(張積模,1992: 96),卡斯拉(Parichehr Kasra)、麥卡錫(Justin H. McCarthy)等人曾有以散體譯「魯拜集」的經驗(童元方,2015: 60-61)。具體到漢詩英譯的問題上,這個傳統則是另外一種面貌了。在漢詩英譯方面曾以散文體來譯中國詩的海外譯者比較有限。其中比較著名的是由《紅樓夢》英譯本獲得盛名的翻譯家霍克斯和杜甫研究的專業人士洪業(William Hung)。

散體譯詩的譯者除翁顯良外,都或多或少是將散體譯詩當作一種變通之法,只有翁老真正認為漢詩就該散譯,散體譯詩與韻體譯詩,後者源遠流長,從業者眾,成品數量宏富,構成漢詩英譯體製的主流;前者源流難考,躬耕者寡,譯作規模有限,只是漢詩英譯體製的支流。

二、釋義法:時政文中詩歌翻譯的另一種路徑

(一) 何謂釋義法

釋義(paraphrase)是指舍棄原文中的具體形象,直接解釋出原文的意思。在翻譯一些具有鮮明民族色彩的文字(成語、典故等)時,如果直譯不能使譯入語讀者明白意思,而加註又會使譯文太啰嗦,並且原文「重意不重形,重意不重典」時可採用釋義法,能夠使譯文簡潔明了又不損害原文意思的表達。

劍橋詞典對paraphrase一詞的解釋為「to repeat something written or spoken using different words, often in a humorous form or in a simpler and shorter form that makes the original meaning clearer.」(*Cambridge English-Chinese (Simplified) Dictionary*)

古詩歌作為中國極具內涵與民族色彩的文化,將其內容原封不動直譯出來必然會導致其語意的流失,也因此才有了「韻體譯詩」、「散體譯詩」之類詩歌翻譯的路徑,不論何種路徑,其目的都是將詩歌的意境與意思忠實地傳達給讀者。殊途同歸,釋義法作為詩歌翻譯的新路徑也可以完成傳達詩歌含義的要求,也正因此,釋義法譯詩才會被用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至三卷中。

(二) 自由體譯詩——釋義法譯詩的實踐基礎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三卷本的譯文版出版,其目的是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彰顯中國智慧,是面向廣大海外讀者的。因此,借鑒西方漢學家對於漢詩英譯的策略有助於更好地了解外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閱讀喜好,幫助我們將譯文打磨得更加完善。在20世紀初歐美英譯中國詩歌的第一次高潮中,龐德以意象傳神的創意英譯策略聞名於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龐德對漢詩英譯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為,英譯中國詩歌,首先譯文必須是地道的英文表達;第二,譯文的意義和氛圍應忠實於原作。從龐德、王紅公、加裏·斯奈德,到韋利、華茲生、大衛·辛頓,他們的漢詩英譯,都在西方讀者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他們的翻譯策略,炯然有異於中國的譯者。首先,他們都採取不同形式的自由體譯詩,舍棄了漢語詩歌的尾韻,詩行長短不齊、多寡不一,而這正是中國譯者抓住不放、津津樂道的方面。

然而中國譯者也有革新求變之心,在他們看來,譯者不能過多地超越作者,忠實於原文的形式和內容,是漢詩英譯的永恒標準。至於原文的形式,西方譯者恰恰表現出不忠實之後的叛逆,因為他們更了解西方



讀者的審美期待：在自由體詩歌盛行的英語世界，西方讀者不喜歡押韻，尤其是押尾韻的詩歌，也不太在意詩行的整齊劃一。他們所關注的，主要是詩歌內在的詩意與詩美，而不是外在的詩歌形式。

中國譯者中，格律派譯者占大多數；海外譯者多用自由體譯詩，既不必刻意追求詩歌的形美，轉而關注詩歌的意象的再現與內蘊的表達。就西方讀者的接受程度而言，西方讀者更喜歡海外譯者的譯詩。而釋義法在翻譯思想上與自由體譯詩不謀而合，釋義法同樣不要求譯文的結構與格律，注重於詩意的傳達，不同之處在於，自由體譯詩主張將詩的意象在譯文中重現，而釋義法譯詩卻更執著於將詩歌所傳達的含義展現出來。不過不得不說，自由體譯詩作為更為西方讀者接受的譯法，其對我國傳統格律派譯詩的挑戰為釋義法譯詩提供了實踐支撐。

（三）以達意為聚焦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至三卷中出現的中國詩歌數不勝數，其目的是為了增強領導人講話的說服力，加深讀者的印象。詩句的引用讓總書記的號召更加鏗鏘有力，讓總書記的關切深入人心。三卷本的英文版為了達到同樣的效果，勢必要將詩句的內容譯成更加精簡，海外讀者更容易讀懂的语言。釋義法譯詩既不講究「以韻譯韻」，也不追求將詩篇中的意思完整的表達出來，其核心在於將詩句的內容以最簡單的方式呈現給讀者。

例 1：

原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卷二：317）

許淵沖譯：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oh! I'm grieved at a life full of woes. (2009: 8)

楊憲益夫婦譯：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2001: 10)

大衛·霍克斯譯：Heaving a long sigh, I brush away my tears. Sad that man's life should be so beset with hardship. (1985: 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譯：I sigh and cry, how hard life is for my countrymen. (Vol. II: 345)

上述三種譯文都盡力保留了詩句的詩韻，在分段和用詞押韻上都刻意還原詩歌本身的文學特點。而在英文版中被譯為了「I sigh and cry, how hard life is for my countrymen」，其意思被簡化成「百姓的艱苦生活令我時常嘆息哭泣」，這種譯法將原句解釋成了更貼近英語母語人士日常交流的語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舍棄了一些原文的韻味，但將原句內容更為直觀的展現給了讀者，簡化了讀者的閱讀過程，減少了因文化不同而可能產生的障礙。相較於其他翻譯家的譯文，釋義法譯詩削弱了詩句的文學性和內在的情感，將詩句以陳述句的方式再現，其目的就是為了開門見山地傳達詩句的意思，既「我對世人們艱難的生活感到嘆息與悲傷」。翻譯家們的譯文更希望將原文的詩韻保存下來，更忠實地表達外國讀者，其目的是為了傳播中國古代文學。而在政治文本中，更重要的是闡明政治主張，重要的是詩句以外的內容，詩句只是佐證核心政治思想的工具，所以需要更加直觀的翻譯出來。

例 2：

原文：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卷二：317）

許淵沖譯：Could I get mansions covered ten thousand miles, I'd house all scholars poor and make them beam with smiles. (1999)

楊憲益譯：Oh, for a great mansion with ten thousand rooms where all the poor on earth could find welcome shelter. (200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譯: Where to find decent homes? To shelter all poor scholars on earth and bring a smile to their face. (Vo. II: 345)

楊憲益與許淵沖對第一句的翻譯大同小異,不僅都將廣廈譯為「mansions」,也都將「千萬」這一定語以伴隨狀態表達了出來。而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整句採用簡潔直白的形式,沒有過多累贅的翻譯「千萬」、「寒」等修飾詞,直接了當地將原句的真實含義表露出來。這與傳統的韻體譯詩和散體譯詩的標準皆是不同。將原句的意思直接並完整的表達出來一度是釋義法翻譯古詩詞的標準之一,也是為了符合政治類文本的特點,在後文提到了「all poor scholars」的時候,前文便不再過多贅述「千萬」一詞了。此外,將「天下」一詞點出來翻譯為「earth」也能夠充分展現習總書記決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包容接受全世界人民的魄力與魅力。

即使是近代詩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也保持了釋義法譯詩的一貫作風。如毛主席的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裏」在被譯為「Should I have 200 years to spare, I will surely swim for 3000 li (1500km).」單看譯文讀者甚至會覺得這根本算不上一句詩歌,但就是這樣的直接有效的翻譯才能徹底將毛主席既豪邁又對自己的前程充滿無限的信心,堅信此生鴻鵠之誌必將實現的意境表達了出來。全句沒有任何過多的修飾辭藻,才讓譯文所想要傳達的意義成為了最閃光的部分,而這也正是釋義法譯詩以達意為聚焦的特點。

(四) 形式自由靈活

釋義法譯詩沒有固定的形式與公式,對於不同的句子可能譯文風格大相逕庭。

例 3:

原文:「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卷二: 317)

許淵沖先生譯: Each bowl of rice, who knows! Is the fruit of hard toil. (2000: 48-51)

卓振英教授譯: Who ever knows that in the plate each grain, of rice has come from much toil and much pain? (2003: 17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譯: Every grain on the plate comes from hard labor. (Vol. II: 348)

在第一种翻譯中,許淵沖先生在乎詩歌的結構,盡量減少了用詞以保證原文譯文的字數相近。並且許淵沖沒有將「粒粒」局限於米飯中,而是擴大到了所有的農產品農作物,考慮到外國人尤其是西方國家與我們飲食習慣的不同,其對於大米的情感不如中國人豐富,所以這裏算是許老先生一種歸化翻譯策略。第二种与第一种相同的是,二者都在用詞上保留了詩歌應有的押韻與格式,不同的是卓振英譯文字數更多,其情感表達與內容也更加豐富,他將「辛苦」進一步解釋為「辛苦與痛苦」,不僅是加深了原詞的含義,一定程度上也與另一首詩中「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有所呼應,強調我們所享用的食物有的是農民的汗水甚至生命。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則取消了詩句的分隔,兩句並作一句,由於釋義法譯詩不可以追求固定的形式,所以在一些情景下可以在保留完整意思的情況下最大化的精簡單詞的數量。

例 4:

原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卷二: 317)

許淵沖譯: The mansions burst with wine and meat; The poor die frozen on the street (2000: 94).

宇文所安譯: Crimson gates reek with meat and ale, while on the streets are bones of the frozen dead. (2006: 13)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譯: The rich wine and dine, the poor starve and die. (Vol. II: 348)

外文出版社的釋義法譯詩少有的在譯文中不僅保留了詩歌的解構,還保留了詩歌的韻味,並且較之許老先生的譯文更加的簡練。不僅如此,由於在古代王公貴族都樂於將大門塗成紅色,所以句中「朱門」指代的就是富貴人家,許老先生和外文局都採用了將其譯為「富人」或是「官邸」。而宇文所安仍然將「朱門」直譯了過來,對於不懂得中國文化的外國人而言,可能在閱讀時會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礙。在這一點上釋義法譯詩與韻體譯詩又有了幾分相似。但是,釋義法放棄了原句中「臭」「凍死」「路」等詞語,不像前兩種譯文盡心盡力的將這些詞語作為詩句的重要部分傳達出來,而是注重於渲染富人夜夜笙歌,窮人餓殍遍野的意境。雖似韻體譯詩之形,卻不拘於其中。

上述兩句的譯文,一邊是一句完整的陳述句,另一邊則是並列的兩句話,前者無韻可言,後者卻突然冒出了韻腳。可見相較於傳統的韻體譯詩與散體譯詩,釋義法下的漢詩英譯並無過多規則可言,只要能夠表達詩歌所指,句子的形式就好像天上的雲朵,什麼形狀都是可以接受的。

又例如劉禹錫的《烏衣巷》中的詩句「飛入尋常百姓家」(卷三: 312),書中直接放棄了詩句的外形,譯為「promote ... among the people」,原句是「讓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英文版已經看不到詩句的影子,變成了一個短語而不再是單獨的句子。再次表現出釋義法在詩歌翻譯中獨特之處。

(五) 重在可接受性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的海外版,其目的是向全球各族人民傳遞中國聲音,分享中國智慧,對於書中的一句一篇都要能讓世界各國人民最大程度的接受,所謂可接受性,就是指譯文要更加符合英文的語法習慣和表達方式。而要想達到這個要求,對於書中的詩歌就必須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出來。

例 5:

原文:「不畏浮雲遮望眼」(卷三: 226)

文殊、王熙晉、鄧炎昌教授譯: I have no fear that floating clouds may blur my eyes, (1994: 26)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譯: Unperturbed by the clouds that obscures our vision. (Vol. III: 264)

書中的譯文完全抹去了原詩句中的「不畏」這一動作,將句子的表現力以更加靜態的形式表達了出來,更加符合了英文偏靜態的特點。此外,「blur」一次有「塗汗,弄臟」的意思,而「obscure」意思則是單純的「使...模糊不清,掩蓋;隱藏」,針對原句「浮雲」遮眼,「obscure」在意義上更加符合原文,能夠避免外國讀者產生對於「cloud」為什麼會「塗汗」視線的問題。

白居易《與元九書》中的一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本是兩句詩,意思是「文章應該為時事而著作,詩歌應該為現實而創作」,英文將其合二為一,譯為「Prose and poetry are composed to reflect the times and reality.」。「時事」與「現實」在句中本就是意思相近的並列詞。英文多用名詞而中文多用動詞,英文偏靜態而中文偏動態,因此兩句合一減少了動詞的使用,更符合英語的語法習慣,讓譯文對英語讀者的接受度有了提高。

再例如談到對黨忠誠時,總書記強調:

黨內所有的政治問題,歸根到底就是對黨是否忠誠。忠誠是共產黨人必須具備的優秀品格。「忠誠印寸心,浩然充兩間」的堅毅,「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無畏,腹中滿是草根而寧死不屈的氣節,十指釘入竹簽而永不叛黨的堅貞,無數先烈用鮮血詮釋了對黨的忠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卷

三——《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

句中「忠誠印寸心，浩然充兩間」一詩在英文版中被譯為：「My loyalty come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nd it stretches all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Heaven.」對於「兩間」一次，按照中文的習慣，這裏的「兩間」指的是天地之間其實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然而譯者沒有將文中隱含的「天」譯為「sky」，而是將「兩間」翻譯成了「Earth to the Heaven」。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外國讀者信仰在天上還有天堂這一理念，讓外國讀者讀起來更加親切。

三、結語

隨著中華文化復興如火如荼的進行，時政類文本的外宣工作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讓世界認識中國、了解中國、愛上中國是廣大翻譯工作者義不容辭的使命。《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被譯為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語種並出版發行，其全球發行量已超千萬並深受各國人民與領導人的喜愛，足以證明書中所含有的中國古詩歌的譯文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認可與稱贊。也證明了釋義法作為時政文本中詩歌翻譯路徑的可行性。就時政文中的漢詩英譯而言，筆者認為，譯詩宜採取釋義法，釋義法將翻譯重點放在詩歌的意義傳達上，不墨守成規，沒有固有的形式與翻譯風格，充分地傳達漢語詩歌在時政文內所蘊含的意義。這樣，雖然在詩歌的形美方面有所損失，卻有可能保證英譯後的漢語詩歌，為廣大西方讀者更容易接受。採取釋義法譯詩，即意味著漢語詩歌在英語世界的現代化；只有這樣，漢詩英譯才能吻合當代英語詩歌的潮流，最終有利於漢語詩歌走向西方世界，促進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交流互融。

注釋

- ① CHEN Bing & LI Xiaoyan. (2022).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Zhuang D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 107-116.
- ② JIN Suning & XU Jingwei. (2022).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area studie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idelberg Center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 in Germany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063-069.
- ③ XI Jinping. (2014).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④ XI Jinping. (2017).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⑤ XI Jinping. (2020).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⑥ YAN Jin, YUAN Bei & XIAO Youliang. (2022).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y on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2(3), 117-123.
- ⑦ ZHANG Xinlei. (2022). The Chinese im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A case study based on *President Xis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to Review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and Commend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volved*.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145-152.
- ⑧ 蔡新樂、郁東占：《為什麼要將釋義學引入文學翻譯理論？——有關〈文學翻譯的釋義學原理〉的一些問題》，《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頁7-12。
- ⑨ 辜正坤：《中國詩歌翻譯概論與理論研究新領域》，《中國翻譯》，2008年第29卷第4期，頁34-38+95。
- ⑩ 海岸：《詩人譯詩 譯詩為詩》，《中國翻譯》，2005年第6期，頁27-30。
- ⑪ 錢雅欣：《許淵沖文學詩歌翻譯理論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 ⑫ 榮立宇、張智中：《略論漢詩英譯的散譯傳統》，《東方翻譯》，2018年第1期，頁32-36。
- ⑬ 翁顯良：《意態由來畫不成？》，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3年版。



- ⑭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
- ⑮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
- ⑯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
- ⑰ 葉友珍、趙正道:《翻譯學研究的本體論思考》,《外語研究》,2017 年第 5 期。
- ⑱ 張智中:《中國古詩英譯的策略——以〈靜夜思〉的英譯為例》,《語言教育》,2021 年第 9 卷第 4 期,頁 51-57。
- ⑲ 張智中:《陶冶性靈存底物 新詩改罷自長吟——論許淵沖先生中國古典詩詞英譯的改譯》,《外語教學》,2005 年第 4 期,頁 69-76。
- ⑳ 趙彥春、連蓉:《韻不絕,詩乃存——「以詩譯詩、以韻譯韻」方為正道》,《外語學刊》,2021 年第 2 期,頁 84-89。
- ㉑ 卓振英:《漢詩英譯方法比較研究》,《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 年第 10 期,頁 32-36。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